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婧涵,胡芳.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方法和模式[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2): 98-104.

# 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方法和模式

王婧涵 胡芳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逐步觉醒,对西方资本主义生态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对生态治理新模式展开探索具有必要性。通过分析西方资本逻辑下生态治理的内在不足发现,中国确立了深邃历史观、绿色发展观、科学自然观、共赢全球观等生态治理现代化新理念,推进了生态治理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迈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构建了制度建设、绿色发展、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生态治理新模式,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生态治理;现代化;绿色发展

**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2-098-07

在工业革命的驱动下,资本主义文明确立了单纯的经济发展观,并形成资本逻辑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西方国家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传统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作了反思与变革。不可否认,西方国家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的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价值,但是,中国生态治理的现实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模式和路径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中国把生态上升到“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sup>[1](P51)</sup>高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 一、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sup>[1](P374)</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把“自然休养”发展为更为积极主动的“生态修复”,并赋予了生态治理更多独立性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sup>[3](P23)</sup>,融合了深邃历史观、绿色发展观、科学自然观和共赢全球观,深化推进了生态治理的新理念。

(一)深邃历史观: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重要论断

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马克思明确提出历史科学的概念,指出其由“自然史”和“人类史”组成。两者相互关联、彼此制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史对自然史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毋庸置疑,工业革命曾使人类掀开了文明史崭新的一页。但在工业文明的推进中,资产阶级疯狂扩大生产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力求资本无限的积累,甚至奔走于各国之间,只为扩大产品销路获取更多利润。他们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产生大量的工业废品肆意地污染生态环境,进而导致了全球化的生

收稿日期:2022-10-15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研究”(22AZD063)

第一作者简介:王婧涵(1996-),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通信作者:胡芳(1983-),女,湖北天门人,特聘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E-mail:304605793@qq.com。

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感叹工业文明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批判了其带来的弊端,并对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给予了严重警告,“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sup>[4](P429)</sup>。而“生态兴则文明兴”的论断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时段视野上审视生态与文明的关系,将文明兴衰直指于生态,揭示了生态与文明兴衰之间的深刻关联。这一重大论断旗帜鲜明地指出“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sup>[5](P21)</sup>,彰显了生态与人类文明的重要关系,二者命运与共,兴衰相依。

(二)绿色发展观: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提出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为目标,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sup>[3](P50)</sup>这是我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更是我国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sup>[6](P198)</sup>。具体而言,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人们向自然索取资源、破坏环境而忽视了生态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第二个阶段提出了“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凸显,如何平衡二者关系成为难题。第三个阶段则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意味着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出现矛盾和冲突时,牺牲生态环境确保经济发展并不可取。相较于经济发展而言,生态环境处于优先性地位。由此可见,绿色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底色,是人类从自杀式生存走向生态自我救赎之路的重要标志。在对时代的反思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理理念旨在打破“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取代粗暴的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两山”理念实现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和发展。

(三)科学自然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引发了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进而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究其根源,资本

主义私有制度下的生产范式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也使得人与自然走向了对立。马克思坚决反对仅仅从交换价值的需求出发,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占有,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sup>[6](P24)</sup>。中国式生态治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的和解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sup>[3](P49~50)</sup>其中“尊重自然”要求人类保持一颗敬畏自然之心,不能因一己私利破坏自然的生态秩序。“顺应自然”要求人们在充分认识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自然”则要求我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推进人类自身变革,这不仅仅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关乎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们期待着生态治理现代化能够克服生态破坏、能源紧张、自然灾害等现代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没有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体现出其价值取向中鲜明的人民性。

(四)共赢全球观:构建“生态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面对全球生态治理困境,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中国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场上,为引领建立“一带一路”生态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国,始终将绿色作为“一带一路”的亮色和底色,率先提出“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sup>[8]</sup>。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着多重生态问题,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环境,将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以经济补贴的形式将有毒废料排放到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种对生态资源的滥用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体现;另一方面,部分国家资源单一,重度依赖自然资源来获取经济利益,造成了生态失衡。正是在生态这一弱意识形态性话题下,各国更容易对环境保护达成共识。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率先结合成“生态共同体”,厘清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命运,不仅要在经济层面互利共赢,在生态发展与生态治理上也要命运相依,共建共享,“将生态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sup>[9]</sup>。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在建设清洁能源绿色项目,完善生态治理机制,打造绿色金融等方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做出了大国应有的表率。建设绿

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只有人类并肩同行构筑生态共同体,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的生态治理理念才能得到更多国家认可,全球生态治理之路方能行稳致远。

## 二、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方法

中国基于创新的生态治理理念,取得了一系列生态治理成效。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民生福祉,使得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推进了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一)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sup>[1](P362)</sup>,习近平总书记把民生问题放到优先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生态环境上升为党的重大问题。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需要更宜居的生态环境和更优质的生态产品。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问题,同时满足人民“盼环保”和“求生态”的绿色发展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方法论的重要体现。

首先,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实现生态惠民。生态环境是人类最好的资源禀赋,也是关乎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只有保护生态环境这个人类生存之根本,方能给予子孙后代公平的生存发展机会。在鼓励人民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之时,也应保障人民的生态权益,即人类占有、享用从自然中获取利益的权利。人民拥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监督权、表达权、参与权,可以同一切损害人民群众生态权益的行为做斗争。

其次,推进人民群众的生态富裕,实现生态利民。习近平坚持将经济富裕与生态富足进行有机结合,强调应利用好生态环境这个公共产品,实现民生发展。与西方破坏生态的利己主义者不同,我们在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化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一方面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即用产业发展规律有序进行生态建设,将生态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促使生态资源合理使用,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另一方面,具有特色的生态资源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其生态优势,通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

旅游业,带动人民群众发展,走向富民利民的生态富裕之路。

最后,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态安全,实现生态为民。“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sup>[5](P90)</sup>新时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样体现在生态上,尤其是对环境宜居、饮食健康的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渴望,已成为人类关乎生存的第一需要。生态问题无疑是民生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推进智慧城市、绿色社区的建设,坚持退耕还林、退湖还草等治理举措,完善生态预警机制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安全,让人民实现安居乐业。

(二)“两点论”与“重点论”: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sup>[5](P23)</sup>。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科学指引。

“两点论”体现为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两手都要抓。良好生态环境既是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体现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如果罔顾生态环境走下坡路而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必将会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通过生态治理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的环境保护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只有处理好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才能赢得“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重点论”体现为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并不意味两者是平等关系,生态环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优先地位。坚持保护环境优先,就是在守护好治理好“绿水青山”的基础上创造“金山银山”。这要求我们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因争取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在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才能在保护中求发展。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需要不断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转化。“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sup>[11](P312)</sup>。提升生态治理能力,重点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将经济结构调整与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减少经济生产中物质变换过程的损耗,创造高效的经济效益,推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协同共进。

(三)系统方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治理

系统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思维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sup>[3](P11)</sup>,体现了生态治理中系统方法论的运用。

第一,全方位加强生态治理。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爆发深刻影响了自然根基,在人类生态命运的转折点上,习近平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角度,率先提出构筑“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强调要用整体系统观正视自然生态,把自然看作一个整体进行部署,整体中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要素互相承载着各自“命脉”,任何一个割裂出来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全方位生态治理旨在坚持综合治理思路,实现统筹协同全域治理,它要求我们树立大局观,算长远、整体、综合账,从而实现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的统一。生命共同体的提出,是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更是“推进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方法。

第二,全地域加强生态治理。宏观上“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sup>[3](P51)</sup>,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理应严控其开发强度,优化其空间结构,让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合理分配,给后代创造美好家园。微观上“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sup>[3](P51)</sup>,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还以生态空间的本真性、完整性,在城乡、区域和流域方面实行生态文明全地域治理。

第三,全过程加强生态治理。构建生态治理机制,加强源头治理、过程控制、后果惩罚的全周期管理。一是找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开展源头修复治理并建立相关制度法规。二是过程中实施严管,对污染物实施全过程监管,构建风险预警、防范和治理体系。三是注重后果惩罚机制以形成警戒,对违法问题严惩不贷。在工业、农业的全过程中加强生态治理,竭力减少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

三、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回顾和总结过去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的工作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sup>[3](P11)</sup>这说明中国生态治理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治理成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生态治理新模式,擘画出美丽中国的生态图景。

(一)行动指向: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稳步推进

中国正全面开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承诺在 2030 年完成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为建设美丽世界践行中国行动。自生态治理理念提出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治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2022 年北京冬奥会“绿色冬奥”的成功实践更是展示了中国的生态名片,进一步推进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蓝图。

第一,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历程从“三废治理”到重点污染城市治理,再到“三河二湖二区一市一海”,从三大行动计划到污染防治攻坚战,再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中国在生态保护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治理成效,污染物总量逐步削减,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由 2015 年的 46 微克/立方米降至 2021 年的 30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7.5%,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加快推进,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显著减少,2021 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 84.9%。”<sup>[12]</sup>生态永续发展成效初步体现,生态环境的质量显著提高,大幅提升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幸福度,初步实现了蓝天碧水净土的美好愿景。

第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有效提升。随着生态文明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逐步健全,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稳步提升。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开通了反映和表达问题的公众渠道,加大了信息公开的透明度。通过对环保工作及其成效进行公示,推动了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将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摆到了更高位置。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重点关注长江黄河流域等措施,打响了“蓝天保卫战”“污水防治战”,极大地推进了生态治理问题的解决,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三,绿色冬奥硬核彰显中国生态名片。在 2022 年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绿色冬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

中国的坚强决心,冬奥会全部场馆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将“水立方”化身为“冰立方”,采用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保障运输,场馆一律使用绿电供应。在坚持“绿色办奥”过程中,中国坚持“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方面,北京冬奥会积极推动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应用,另一方面通过2008北京奥运会场馆遗产使用,避免重建和大肆消耗能源,从源头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与消耗。北京冬奥会的“北京蓝”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一致好评,创造了特大城市污染治理的奇迹,这既是中华文明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生态治理思想在北京冬奥会的深入实践。

## (二)制度保障:建立“四梁八柱”的生态制度模式

随着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结合实践中取得的成就,生态治理现代化对生态制度提出了发展创新要求。这意味着制度建设需要建立起生态制度的“四梁八柱”,彰显生态红线、自然资源有偿、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的制度优势,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注入生机活力。

第一,划定“生态红线”的严格生态保护制度。红线作为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具有不可僭越的威慑性。生态红线的划定是中国生态安全保障,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制度创新,是在坚持底线思维前提下创立的生态保护制度。面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筑牢生态红线是生态文明治理的重要方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利用科学技术评估红线范围,形成与区域协调相对应的创新。以环境最大承载力为基准,对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地带进行划分,严控红线内部的人类活动,避免红线划定与区域规划交叉重叠形成冲突,防止过度经济建设和过度环境保护的极端现象。二是对生态红线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创新。以保护红线范围内原住民的利益为前提,采用生态移民、直接补偿等方式,协调好红线内外、个体与公共的利益平衡。三是坚持整体思维和底线思维,以整体性的生态管理模式避免部门职责分散化,对生态保护设定最低限度,力求解决人类需求和环境现实之间的矛盾。

第二,落实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人靠自然界生活”<sup>[6](P55)</sup>,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盲目追求资本增殖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无序攫取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同,生态文明对因资本“普遍占有”自然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进行理性反思,遵循“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目标旨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生态效益,将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觉醒转化为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优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一是自然资源发展与保护并重的辩证思维方式。技术理性的胜利使自然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需要对自然资源采取“保护优先”的策略以恢复人与自然平等的地位。要打破思维定势,阐明以“绿水青山”为代价换“金山银山”的发展策略不可持续。二是将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以增强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自觉。我国法律规定自然资源归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产权分离使责任主体更加明晰,资源使用者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要强化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意识,更加注重从生态维度反思自己攫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方式和手段。三是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二元联动为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管,改善由低成本使用自然资源而引发的浪费、过度开采等生态外部负效应。

第三,回归“自然修养”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兴”与“文明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导致的生态容量高负荷,抑制了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为避免人类文明陷入“失之难存”的窘境,构建生态文明新形态是文明永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sup>[6](P55)</sup>,扎实落实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彰显了中国关于自然界生命性质和生态意蕴的态度,是促进呈现“主客二分”工具理性景观的工业文明向高扬生态理性的生态文明转向的必然举措。具体来讲,生态补偿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晰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自然界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生态问题往往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量化主体责任和受益者权益为生态补偿改革落到实处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权责明确、监督问责的运转方式有助于激发社会生态意识自觉,增强生态主动性。二是分类补偿、综合补偿协同推进,对国家划定的关乎生态安全重点功能区予以政策倾斜、适度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助推人与自然良性互动与发展。三是践行由政府主导、市场机制联动、社会有序参与的多元生态补偿实践,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联动助推人与自然双方互惠,彰显人与自然结成生命共同体观念的系统思维和整体观。

## (三)绿色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

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挑战迫使我们必须从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转向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不断创新绿色技术发展方式,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辩证统一。

第一,坚持“生态就是经济”的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产方式要求改变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实现经济模式的生态化转变,将生态要素逐渐融入到经济生产领域。利用好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确立了清晰合理的绿色生产方式。一是坚持循环经济,由传统单向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反馈式发展,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以达到经济与生态双赢的目标。循环经济强调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提出工业生产中的“绿色供应链”模式并构建企业之间的“生态产业链”以促进生产循环。二是坚持低碳经济。绿色生产方式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具有低耗低排、再生再用的优势,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温室气体排放居于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将力争在 2030 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从过去的煤炭钢铁类高碳能源大量使用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我国正处于能源结构转型关键期,“低碳城市”“低碳校园”“低碳交通”等词汇不断映入眼帘,可降解塑料袋、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成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成果。总体而言,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助推中国朝着“双碳”目标稳步前进,为实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助力。

第二,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绿色科技作为新兴领域成为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发展的重要动力,绿色技术也日益成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绿色技术最初被称之为“末端治理技术”,用于污染治理,其理念要求注重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也将绿色能源与人工智能融合起来,体现绿色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手段的出现,为生态环境监测、生态治理、能源转化提供了契机。例如农业中的生态节水技术融合人工神经网络和数据通讯技术打造精准灌溉系统,实现快速检测和精量控制;创新清洁能源生产技术使用自然能源代替矿产能源;光热发电、海上风电等技术强劲增长,实现自然资源内部优势互补,构成优化的清洁能源体系。随着科学技术在绿色发展中的投入,市场环境不断优化。以绿色创新为动力促使各类能源技术创新转化,实现了资源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

(四)协同治理:实现“生态善治”的生态共治模式

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保证系统内各部分有机结合,才能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整体性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治理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sup>[13]</sup>,实现环境从“被治”到“共治”的有效转型。

第一,超越“单维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去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着“九龙治水”的沉痾旧疾。生态治理现代化主张摒弃“画地为牢”做法,树立整体协同治理理念。传统生态环境治理的单维模式,即运用政府权威对环境控制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式微。生态环境特性也决定了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其中,政府由过去主要采用“命令—控制型”方式逐渐转变为采用“激励—诱导型”方式,发挥主导作用;企业需要加强源头自治、过程自治,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发展相统一;在开放性的公共治理平台中,需要畅通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渠道,以便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由此,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自发性、内源性的良性生态秩序。中国正处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期,在“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生态治理现代化更需要持续创新,以破解环境难题,打通智慧政府和理性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有效利用活力市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晰政府、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权责,畅通参与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sup>[14](P422)</sup>以实现生态治理效能最大化。

第二,打破“信息瓶颈”实现治理信息共享模式。数字经济时代下,更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平台实现生态治理,开通反映和表达问题的公众渠道,加大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对环保工作的开展与成效进行公示,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一是要突破社会信息单一局限,实现社会生态治理资源精准调配。传统社会生态治理存在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信息不畅等问题,现代社会生态治理能够利用万物互联的技术优势,打通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信息壁垒,实现社会生态治理资源合理调配,避免出现分段治理、多头治理困境。二是要突破传统社会生态管理模式,实现社会生态立体化治理。通过创新生态信息共享方法,建立多元共生生态治理信息传播路径,实现不同区域之间信息实时共享,同一区域实现统一监测和信息发布,形成生态共建共享理念。三是实现生



态信息“微”传播,打造贴近生态治理实际的信息共享模式。通过建构多元互动的交流平台,对错误的生态治理信息进行及时批判,澄清事实真相,确保信息准确性。生态信息治理模式不是突破党领导的“无政府”的自由治理模式,而是对党和政府生态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个地域实现资源、信息等共建共享的发展状态,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等资源相结合,使社会生态治理更加科学化。

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摒弃了资本逻辑下西方国家生态治理模式的不合理性,选择从历史出发看生态发展与文明兴衰,从现实状况厘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从未来发展理解人与自然和解,从人类共同价值出发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创新并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系统整体的方法论,构建了从法律制度、经济发展、公共治理等视域的新模式。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促使各国打破“博弈困境”,中国率先向世界证明,作为后发展国家也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中国立足本国国情,贡献了整体系统的和谐共生思想,提出了全球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观,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未来的中国将始终在逆境中求发展,在反思与自省中持续创新,促使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和谐共生共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持续做出中国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4]列宁.列宁全集:第5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习近平.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6-6-23(2).

[9]环境保护部,等.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N].中国环境报,2017-5-9(3).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3]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9(5).

[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 肖芬蓉 E-mail:simple5222@163.com